

# 黄兴人际关系的生动展现

——读《领袖与群伦——黄兴与各方人物》

王 开 宁

1916年10月31日黄兴逝世后,章太炎写下了“无公则无民国,有史必有斯人”的挽联,高度概括了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,以及其短暂而伟大的一生。由于挽联概括了章太炎对逝者一生功绩的洞识卓见而传诵一时,并成为后人评价黄兴常常称引之词。这幅挽联,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章、黄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。

俗话说:“牡丹虽好,还需绿叶扶持。”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,是与团结在其周围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分不开的。领袖只有同他们团结在一起,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,才能更好地发挥个人的作用,形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。黄兴一生的革命活动也生动地说明了这样的道理。

黄兴素以革命实干家著称。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,处处以大局为重,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,与各方面的革命力量都保持了较好的联系。尽管黄兴与一些人有过政见分歧,但由于其盛德大量、光明磊落、宽容谦让、诚信待人的高尚品格,仍能与他们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,为推进革命起了重要作用,因而深得众人的景仰。

近些年来,我国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史做了更深入、广泛的探讨,特别是加强了对黄兴等人的研究,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果。然而对孙中山、黄兴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与友谊,特别是同心协力、共策革命的关系,其研究成果却微乎其微。近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、黄兴研究室主任萧致治主编的《领袖与群伦——黄兴与各方人物》(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,以下引文只注页码)一书,深感这种研究局面已开始改变,并有助于将辛亥革命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。

《领袖与群伦》是我国第一部探讨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专著。全书共收论文53篇,分为“伟人风范”、“黄兴与全国志士”、“黄兴与其他人物”三个部分,分别探讨了黄兴与孙中山、章太炎、宋教仁、蔡锷、胡汉民、陈天华、谭人凤、李书诚、龙璋、章士钊、刘揆一、马福益、程潜、吴玉章、朱执信、李烈钧、马君武、陶成章、汪精卫、陈炯明等50余人的关系与友谊,生动而形象地展现了黄兴宽厚为怀、至诚待友的崇高风格,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年黄兴与各方人士密切配合、联合斗争的情景,并表彰了他们为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综观全书,我们可以看到,《领袖与群伦》尽管主要探讨的是以黄兴为中心的人际关系,并以其生年为主线,但由于涉及的人物较多,因而全书各篇风格各异,颇具特色。因此,该书不仅资料丰富,而且整体结构好,同时,许多文章文笔精炼,论理透彻,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特别是探讨黄兴与孙中山、章太炎、宋教仁,以及与马福益、汪精卫、陈炯明等人关系的若干篇文章,均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深度,拓宽了黄兴研究的领域,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。

黄兴所处的时代,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,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,民不聊生。沉重的民族灾难,唤起了广大爱国志士走上救国存亡、反清革命的道路。黄兴和许多仁人志士正是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,做出了适应新形势的抉择。黄兴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,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酝酿准备、组织高潮、发动胜利和失败再战的全部过程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黄兴主张效法西方民主政治,希望建立一个富强、独立、统一、现代化的中国,并为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,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武装反清斗争。他深深懂得,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,必须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。这就要求从自己做起,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,不计个人得失,并要善于利用各种矛盾,团结同志,争取使一切积极力量都站在革命一边。《领袖与群伦》一书对此均作了生动的描述,阐明了黄

兴的统战思想。在某种意义上讲,正是由于黄兴的影响和作用,革命统一战线才得以形成,革命力量从南到北,从沿海到内地,几乎都调动起来了。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例,是黄兴把会党首领马福益也拉入到辛亥革命一边,使这位闯荡江湖的草寇英雄,也在民主革命的事业中发出了耀眼的光彩。作者写道:“黄兴是意志坚定的革命志士,但苦于革命力量的薄弱。正是从马福益这里,他看到了下层群众所蕴藏的巨大革命性,更增添了胜利的信心。动员组织这样一支力量投入革命事业,从马福益结义开始,也就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方针。更有意义的是,他们‘结义’‘驱胡’,为湖南民主革命形势的高潮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”(220页)这便是黄兴从事武装革命的第一壮举。

该书在《‘事败垂成原鼠子,英雄地下长无语’——黄兴与陈炯明》一文中,将缔造中华民国的元勋(黄兴)与炮轰总统府的祸首(陈炯明)相提并论,把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的问题,阐述得有理有据,很有说服力。作者指出,这正是由于历史发展的错综复杂性所造成的。在民主革命的早期斗争中,黄、陈二人曾是并肩战斗的同志。陈炯明在甲午战争后,有感于清政府的腐败,也在探索着救世匡时的道路。随着清政府预备立宪真面目的逐渐暴露,以及民主革命浪潮的潜滋暗涨,促使陈炯明抛弃对立宪的留恋,转向了革命。1909年陈炯明在上海毅然加入同盟会,由此开始了与黄兴一起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奋斗的历史。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共同参加的1910年广州起义、1911年黄花岗起义、二次革命、护国斗争等活动中。需要指出的是,作者并没有局限于阐述黄、陈二人在行动上的一致和思想上的相通,而是通过深入地分析,阐明他们之间的区别。作者在总结他们的关系时写道:“综观黄兴和陈炯明之间交往的历程,尽管在思想上、行动上有过齟齬和疏离,但总的来说,无论是在早年从事反清革命,还是后期投身反袁斗争,他们基本上均能同心协力,一起战斗,为创建和保卫新生的中华民国,做出积极的贡献。无论是黄兴,还是陈炯明,在民主革命的早期历史上,均占有一定的位置。”“遗憾的是,黄兴逝世后,陈炯明并没有继承他的遗志,随着其军阀思想的恶性膨胀,最后公然炮轰总统府,从而彻底背叛了他早年与黄兴并肩战斗,孜孜以求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。”(589页)

在论述黄兴与汪精卫的关系一文中,作者将他们分别比作“落霞”与“孤鹜”,是非常形象和贴切的。作者写道:“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,黄兴、汪精卫围绕着对袁世凯的态度这一重要问题上,尽管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,但在具体表现上仍然各不相同。黄兴对袁从利用到将信将疑,最后举兵反抗,态度是鲜明的;汪精卫对袁则是从利用到深信不疑,最后转为失望,妥协成为他的显著特色。”“因此,如果说,黄兴好比是‘落霞’而汪精卫是‘孤鹜’的话,他们一时可以在一起齐飞,但孤鹜毕竟相形见绌。”(563页)

《领袖与群伦》能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,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,对所涉及的有关事件作如实的描述和客观的评价,并敢于冲破某些传统的观点,对某些较重大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,以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。这也是本书的可取之处和主要特色之一。

《领袖与群伦》的出版,填补了辛亥革命研究的空白。它不仅向我们生动展现了黄兴的人际关系,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黄兴的革命本质和革命思想;同时也阐明了以孙、黄为核心的领导群体的形成,以及他们同心协力、分工合作、群策群力,为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目标奋斗的过程。

最后还需一提的是,本书主编萧致治教授在前言中谈到,今后还将组织撰写《黄兴与华侨》、《黄兴与日本》等书,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这些著作早日面世。